



往事拾遗

郭秀仪

256

我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家庭。祖母是中国最早、最大的买办、上海招商局第一任督办徐雨之的胞妹。母亲生了三男五女，不幸三男二女先后去世，只剩下我们姊妹三人。母亲因膝下无子，日夜啼哭。我安慰母亲说：“您当我是男孩好了。我读完中学就去找工作。我也不结婚，终生陪伴您！”

我中学毕业后，经干爹曹鏐介绍，到苏浙皖区统税局工作。后来又由干爹介绍，和黄琪翔相识。那时因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，第三党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）的事主要由他负责。当时蒋介石也想加害于他，全凭他为人机警，逃出了特务的围捕，才得以幸免。所以他的行踪也很秘密。可是为了追求我，他常常在公众场合出现。许多人误以为黄琪翔不再革命，一心追求郭小姐去了。事实当然绝非如此，他是在积极投身革命的同时向我展开追求的。不过当时我已向他表明，我是终生不嫁，以陪伴母亲的。所以他每次请我看电影或参加茶舞会，我都要带着同事陈素心同去。多年后，陈素心忆及此事，还笑谓当年她曾作过许多次不通气的“电灯泡”。

我母亲病逝后，我们搬去舅父家居住。黄琪翔和我舅父是朋友。他有时会来看望我们。相处日久，情愫渐生。后来，他突然去了香港。有天晚上，一位日本记者中村农夫，带着他的信来看我。信中说，他已到

了福建，叫我立即离开华界，到法租界亲友家暂住，同时要我辞去统税局的工作。我都一一照办了。

后来才知道，他是参加福建人民政府的反蒋运动去了。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，他逃亡到香港，准备到外国去。他来信说，很想见我。我便和姐夫的大嫂一起到了香港。他住在一位华侨家，我和大嫂住旅馆。见面后，我送他上船。他便开始了流亡德国的生活。我也就回上海去了。

他到德国后不久，来信向我求婚。在几年的交往中，我深深感到，黄琪翔不仅是一位伟岸魁梧的英俊男子，更是一位刚正不阿、义薄云天的爱国志士。他正是我理想的终生伴侣。而我父亲和舅父也很敬重他爱国爱民的革命精神，并对他所遭受的迫害深表同情，所以同意我去德国结婚。

于是，年仅22岁的我便乘上了意大利“康德罗素”（红伯爵）号邮轮，只身赴德。我在船上被选为“康德罗素”小姐，为此在头等舱举行了舞会。我收到了许多花篮。当时我不肯出席，后来在中国驻汉堡张领事的陪同下，才参加了。舞会非常热闹。大家都想请我跳舞，我说不会跳；他们又向我敬酒，我说不会喝。敬酒的人只好对着我喝了，以示敬意。

在船上我认识了程思远，他带着许多学生去意大利留学。

黄琪翔到意大利的威尼斯来接我。回到德国后，我们举行了简单然而隆重的婚礼。黄琪翔对我说：“我的爱情和事业都寄托在你身上了。”回国后，我们在各大城市的报刊上刊登了结婚启事，奉告亲友。

我们先后两次到过德国。第一次是他流亡德国。然而在那艰苦沉重的生活中，我们却结成了风雨同舟、患难与共的恩爱夫妻。

我们虽然身在异国，却仍然十分关心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。有一次，黄琪翔在柏林主持“中国留学生抗日联合会”召开的大会。会上群情激昂，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进行抗日。其间，国民党政府驻德大使馆十分恐惧，当即向希特勒政府告密，说共产党正在开会。结果来了一些警察把黄琪翔和朱江户两人抓走了。我和全体与会人员立即冲到中国驻德大使馆抗议，要求大使通知德国警察局马上放人，否则我们就待在大使馆不走。后来我又打电话给我们的德国房东，告诉她如果黄琪翔回来，让





他马上到大使馆来。这时黄琪翔已被释放。他到大使馆后，当面和大使交涉，声明学生今后还要开会，表达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抗日决心。黄琪翔慷慨激昂，据理力争，大使不得不同意群众的正义要求。这样我们才离开了大使馆。

在德国期间，我还学会了德文和开车，并取得了国际驾驶执照。

第二次到德国是他出任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。出国前，我们住在上海靖江路，与宋庆龄先生为邻。1929年孙夫人回国主持孙中山先生的“奉安典礼”。黄琪翔曾以秘书的身份陪她由柏林回到北平。因此她对我们特别热情，经常请我们到她家去喝茶谈天，或者送东西给我们吃。圣诞节时，她还送给我们由国外寄来的兰花。当她得悉我们将要离国赴任时，关心地说，战败的德国，什么都很缺乏，于是又赠送给我们许多食品。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伟大的夫人。

到柏林以后，黄琪翔每天去办公。我在家请了一位老师，教我英语，以便参加频繁的外交活动。1937年，黄琪翔毅然回国，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。我们在汉口的德明饭店住了一段时间。那时我每天早上在苏联教练的指导下，学习骑马。这使我尔后在抗日前线能够以马代步。

1938年，黄琪翔到湖南衡阳开会。有一天，蒋介石对他说，你派人去桂林把你夫人接来，陪蒋夫人慰劳伤兵。我便到了衡阳，每天和许多女同志一起出去慰劳。蒋夫人叫副官替我拿大衣，和她同坐一辆汽车。一天，我们看到许多壮丁被绳子捆着在路上走。她要司机停车，叫副官问为何这样对待壮丁。副官回来后说是怕他们逃跑。她回到家里即对蒋介石说：“壮丁用绳子捆着，又不给吃饱，哪能打仗！”蒋介石沉默不语。每天慰劳回来，我和蒋氏夫妇一起吃饭。蒋介石问伤兵有无棉衣。蒋夫人说有，都是新的。言下之意是经他垂询，他们才得以穿上棉衣。

抗日期间，许多失去父母的儿童孤苦无告，流落街头。1938年3月，宋美龄、邓颖超、李德全等人在汉口组织了“战时儿童保育会”，抢救难童，我亦参加了。在召开成立大会的当天上午，我自己一人出去向银行界人士募捐，筹集到善款3万元（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）。下午大会宣布此事时，大家都非常兴奋。以后我们便常常到街头募捐。该会的经济主任是李德全，我是副主任。征募部部长是李德全，我是副部长。后来

我将捐册交给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，请他到国外募捐，也捐了不少钱回来。“战时儿童保育会”抢救了3万名难童，分送到大后方培养、教育。今天他们当中不少已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材。

黄琪翔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时，我任该集团军的妇女工作队队长，组织随军家属慰劳伤兵并成立了宣传队。我们乘大卡车到交战最前线去慰劳，经常遇到敌机在我们头顶盘旋，大家都不害怕。为了做好军民团结工作，我还在樊城建立了一个医务所，为当地老百姓和过路的军人治病，赠医施药，费用由我负担。

八年抗战，我多在前线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我获得了一枚抗日胜利勋章。

1949年，我随黄琪翔由柏林回到香港。他郑重宣布与蒋介石脱离关系，决心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。他终日奔波，动员他的老朋友、老同志回解放区，参加建国工作。有些爱国人士想回国，但又没有旅费。我们便将在香港唯一的花园洋楼变卖了，资助他们回去。

259

（作者：农工党中央名誉副主席）

（选自《前进论坛》2000年3期）

难忘岁月

